

倾听未言之言

人类学对重建美好生活至关重要

吉莉安·泰德

2020年，当人们听到科学家抢先研制出了新冠肺炎的疫苗时，全世界的决策者和选民都为之沸腾。毫无疑问，新冠疫苗的研制成功是21世纪医学和计算机科学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也为全人类战胜新冠疫情增加了筹码。

但是，2021年，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事实证明我们在疫苗分配方面极其不均衡，表现令人遗憾。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即使在某些富裕国家疫苗接种一样困难重重。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化——“文化”即是由半公认的仪式、符号、思想、空间形态、社会关系（不论他们身在何处）所织成的网络。最主要的是，美国等地的民众对疫苗接种同样有抵触情绪（或者委婉地说，是一种对疫苗的“疑虑”）——这严重阻碍了我们的抗疫工作。

尽管在法国等一些国家，政府已经设法打消了民众最初对接种疫苗的疑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民众抵触本身反映出了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一些十分关键、但却常被忽视的问题。想要高效应对瞬息万变（或甚至是应对缓慢变化）的各项挑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依赖医学研究或大数据等所谓的硬科学，还需要一些“软”科学来了解人类的行为和文化。



换句话说，眼界狭隘地妄图依靠一套智力工具就能解决当前的公共政策问题，属于严重的错误观念。我们需要开阔视野，去深刻理解更加广泛的人类环境，以及模型、大数据或科学试验以外的要素如何影响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在上文中，我们谈到了文化，它与环境和政治制度同等重要，而且，文化不仅是我们的公开谈论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看得见的文化”），也包括了我们会常常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常因太过熟悉、太过复杂或过于复杂而不去讨论它们（“看不见的文化”）。

我们必须开阔视野，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全球大流行病，也是为了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养老金等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中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利用狭隘的经济模型或工程科学，纯粹从技术层面试图设计有效的政策，就像紧盯着罗盘在暗夜中穿过一片漆黑的森林。无论我们使用的工具在技术上有多精妙，但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着罗盘，就很可能被树根绊倒。所以说，环境十分重要。

政策制定者如何才能开阔视野？在我成为财经新闻工作者之前，我曾学习过文化人类学专业课程，我认为想要做到开阔视野，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些理念。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给人的印象通常都是枯燥乏味、新奇古怪。因此，对一些政策制定者来说，借鉴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念，听起来可能会很奇怪，但其拥护者们认为，文化人类学就是学术版的印第安纳·琼斯。他曾周游各地，造访偏远地区，研究那些丰富多彩又古老的宗教仪式，而这些，与我们21世纪面临的经济挑战，似乎毫无关联。

不过，对人类文化学的刻板印象不仅是错误的，很可能还会让我们错失良机。是的，人类学家致力于研究人类文化，挖掘辉煌的人类历史中那些五彩斑斓的文化瑰宝。但他们并不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像19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家那样，在研究人类文化时带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倾向。相反，21世纪的人类学家们认为，我们必须抱着尊重的态度来研究不同的文化，因为，这一过程不仅可以让我们与陌生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一点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至关重要），还可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无论我们最初来自哪里。所以决策者参考人类文化学是一种双赢。

毕竟，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鱼不见水。”当人在受到周围环境潜移默化影响时，很难看清其中的文化设定，除非他们能后退一步，与其他文化设定作对比，或者能跳出原有的文化设定。就像人类学家一样，融入到别人的生活中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冲击，这样，你就能更加客观地理解自己所处社会的优劣之处——以及“看不见的文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观察其他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理念和问题解决方法。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人类学家在看待问题时，往往习惯于自下往上看，从整体来观察事物，因此，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这能够让我们在看待问题时拥有更有利的视角。

这听起来或许会有些抽象。但请大家仔细想一下，如果在新冠疫情暴发时，决策者能够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西方政府以及选民能够深入了解一下其他文化的国家中疫情传播的情况，就不会陷入如今的境地。如果我们在看待非典、埃博拉以及新冠肺炎等疾病时，认为它们只是世界的另一端或者那些看起来“怪异”或者“异域”的人独有的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因此而产生危险的自满情绪。在医疗制度的问题上，西方政府本不该如此狂妄自大。如果我们以局内-局外人的视角来审视一下西方国家是如何研制药剂、传递医疗卫生信息并推动公共卫生，我们就会更加容易发现其中的弊端。

西方政府可以借用人类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其他地区吸取宝贵经验。譬如，戴口罩。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人类学家一直认为，口罩的功效不仅在于物理层面（也即其可阻断病菌），还在于佩戴口罩的行为能够传递出强大的心理暗示，提醒人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同时也在向他人传递信号，表示自己将恪守承诺，保护整个社会群体，这在新冠疫情期间至关重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应对疫情时，决策者应当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信号来鼓励人们采纳这种做法，即便这与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相悖。但在有些地区，政府最初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例如，英国政府一开始并不鼓励大家佩戴口罩，甚至在调整了防疫策略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出席公共场合活动时仍未佩戴口罩。虽然鲍里斯最终还是转变了



如果我们忽视了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环境背景，那么，我们终将自食苦果。



立场，但如果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深入了解一下亚洲的防疫经验，就不会出现这种前后信息不一致的情况。

同样，政府在试图宣传医疗卫生信息和转变人们的行为时，应该更早地认识到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原因是人们很少会像科学家那样考虑风险。凡是了解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人，都会对这一点深有感触。早期，我们对埃博拉疫情产生了误判，直到后来，我们在宣传埃博拉疫情时更多地关注了当地的文化背景，并将行为科学与人类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才最终战胜了这场疫情。我举一个例子，2014年在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全球卫生组织成立了抗疫中心，主要负责接治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但中心不透明的高墙将感染者的家属隔离在了外边，无法亲眼目睹自己亲人的遭遇。同时，当政府对外宣传埃博拉疫情时，使用了当地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字眼。后来，政府调整了疫情宣传策略，开始更加关注当地的文化背景，将接治中心的墙壁重新设计为透明的，自此之后，患者更加配合医嘱。这说明，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吸取了埃博拉疫情期间的教训，在宣传时更多地关注到了文化背景。例如，虽然最初有关疫苗的接种信息几乎完全要借由科学家之口向外传达，但美国及欧洲政府慢慢意识到，普通民众根本无法与“精英”群体产生共鸣。因此，政府调整了策略，开始转向由社区语言来宣传接种信息。现在，我们还应当将这些经验教训应用在其他政策难题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如果政府和科学家在制定政策时，不考虑文化背景差异，无法让当地人产生共鸣，就无法在环保政策上获得选民的支持，也很难说服民众转变行为，更不用说激励他们开展利他合作了。自上而下的环保政策模式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学会自下而上地看待问题，设身处地地理解人们的生活，制定一套公平公正的过渡办法，避免让人们对绿色改革产生强烈抵

触情绪。

想一想人们对可再生能源的态度。在西方城市精英群体看来，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道德层面要不言而喻地优越于煤炭等化石燃料。但是，风力涡轮机一般都修建在农村地区，距离这些享有特权的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通常都很远，修建过程破坏的也都是农村地区。围绕煤炭工业发展起来的城镇关停或者没落，也不会影响到城市精英们的身份地位和生计，交通成本上涨也不会波及他们，受影响的都是一些经济困难的穷人。为采取有效策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不仅需要同理心，还需要充分认识到，大多数民众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不同。

但也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医生、计算机科学家和金融家都应该扔掉他们的工具，也不是在说文化人类学就是传播智慧的魔法棒。与传统学术一样，文化人类学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从其中得到的深刻见解难以扩大推广；此外，由于它对世界只能做定性的描述，而非量化研究，我们很难有效地传达它所传递的讯息。定义“文化”有点像在浴缸里追逐肥皂泡：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

关键是如果我们忽视了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环境背景，那么，我们终将自食苦果。相反，如果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能够考虑到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环境背景，就可以创造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发挥出更好的制约和平衡作用。想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综合计算机、医学、经济、金融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将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地看问题视角综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看得见的文化”和“看不见的文化”——重建更加美好的世界。FD

吉莉安·泰德 (GILLIAN TETT) 文化人类学家，现担任美国《金融时报》编辑委员会主席。《人类学的视角：一种看待商业和生活的新方式》一书的作者。

